

胡愈之

中国新闻出版界的泰斗

一、投身新文化运动

本世纪 20 年代末 法国巴黎 酷暑的正午，一派人倦马乏的景象。这时，一位个头不高，清癯瘦削，脸长额阔，三十三四岁的中国人兴冲冲地从巴黎大学出来，拐进了斜对门的一家图书装订作坊，贴身衣袋里揣着《东方杂志》编辑部刚刚寄到的《裁军问题与列强之战争准备》等几篇国际时事评论的稿酬，这家装订作坊的老板经不住他的软磨硬泡，终于在他掏光了身上所有的法郎之后，允许他留在坊中学习用摩洛哥皮张手工制作封面的技术。暑期的两个月一晃而过，然而从此，远在地球的另一端，上海开明书店热情的读者们发现，手中的刊物、著作印制得越来越考究了。即便如此，关

心中国和世界命运的读者怎么也不会想到，远隔重洋的这位同胞徒工，将会给他们带来大 32 开 深红色封面 道林纸插图 印制精美的旷古奇闻《西行漫记》 将会带来皮脊布面 银色烫印书名，全部用重磅道林纸印刷，浅棕色特制楠木书箱包装的 20 卷 600 万字的传世巨著《鲁迅全集》 更没有人会想到他将成为未来的新中国的首位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他的名字就叫胡愈之（1896—1986 年）。

当然，胡愈之在巴黎期间的其它一些活动对其一生的影响，显然比在图书装订作坊的经历更为重要，从装订作坊的徒工到全中国新闻出版界的泰斗，毕竟还有一段极不平凡的历程。然而，巴黎时期的胡愈之已决非寻常之辈了。

伟人是靠头脑生活的，受愈之先生影响的人不计其数，而影响胡愈之的人却寥寥无几。得风气之先的故乡浙江上虞纵然拥有大批近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但真正影响小学愚（胡愈之原名）的，当首推胡父——胡庆皆。胡庆皆先生“做到了极平凡的伟大（愈之语）从而使学愚具备了平易、温容而又倔强的个性特质。胡庆皆先生的开明，使幼小的学愚得以接触到谭嗣同的《仁学》等宣扬民主维新思想的著作，使之“能够看到大世界（愈之语）书香门第的熏陶 给小学愚奠定了坚实的国学根基 并成了热衷于编辑出版工作的‘小报迷’。这一切 使年轻的胡愈之从一介入社会便成了一位个性鲜明、思想活跃、才思敏捷、谦恭好学的文字工作者 并且很快就以丰硕的成果 与茅盾、郑振铎、郭沫若、成仿吾等文坛巨擘的名字一起出现在报头刊尾。

而胡愈之得以来到法国，就不能不谈到他与《东方杂志》的关系了。1914 年夏 胡愈之 18 岁，这时他在绍兴名宿薛朗轩门下习文还不到两年，由于家庭经济情况不佳，就不得不辍学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理化部当了练习生。商务创刊于 1904 年的《东方

杂志》就从属该部。这时的《东方杂志》已发展为大型的综合性刊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文学、社会、时事等许多方面，在国内出版界很有地位。胡愈之到商务大约 3 年之后，被调任《东方杂志》做编辑工作，而他开始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则始于 1915 年，从那时起到 1927 年的 10 余年间，胡愈之共为《东方杂志》著译文章 400 余篇，约计 80 多万字，为《东方杂志》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这时，胡愈之还经历了从外国文艺名人评介、文艺思潮和流派介绍、文艺评论等到国际时事评论的转变，从文学界转入了社会效益更明显的新闻界。“五卅”运动时，他主编了《东方杂志》的《五卅事件临时增刊》，并在其中发表了题为《五卅事件纪实》的长文，详细报道了这次爱国运动的起因和发展过程，引起了反动当局的不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胡愈之亲笔起草了致蔡元培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文化界著名人士的抗议信，并联合郑振铎等七位正直的知识分子联名发表。该信揭露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反革命的真面目，遭到了反动派的忌恨，有消息说，反动派要对胡愈之等人下毒手，胡愈之必须尽快离开中国。由于经济困难，考虑到当时法国法郎同中国的银价比值低，去法国的生活费用比较俭省，便与商务约定，出国后继续为《东方杂志》撰稿，由编辑部开支稿费寄往法国以维持胡愈之的生活。有了《东方杂志》和朋友们的全力支持，1928 年 1 月，胡愈之终于登上了法国邮船“波尔多芬”号，经西贡、新加坡，穿越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再经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入地中海，到达法国南部的著名港口马赛，随即换乘火车前往法国首都巴黎。

人是到了巴黎，可胡愈之这时还不懂法语，也没有熟人，他能够顺利地适应在法国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幸亏他得到了在另一条战线上的同志们的帮助。这条战线就是世界语的国际组织

和团体。胡愈之早在 1913 年在薛朗轩门下奠定国文根底的同时，就通过上海世界语函授班学会了世界语，并且成为世界语运动的积极活动者。在胡愈之看来，世界语的“最后理想就是想从语言的统一”；“使各民族相互了解”；“以求得人类的安宁与平和”，因此世界语运动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和平运动，值得为之奋斗。进商务以后，胡愈之开始用世界语翻译和撰写倡言人类和平的文章。1919 年他联合索非、陈兆瑛等世界语者创立了“上海世界语学会”，在宝山路三德里设立学会的会所，开办讲习班和函授班，推广世界语。1922 年 6 月，上海世界语学会创办了《绿光》杂志 商务的《学生杂志》开设了“学习世界语”专栏 胡愈之为两刊写了许多文章，并促成了世界语学会同世界上不少国家世界语团体和学者的联系，被“环球世界语会”聘为上海代理员。

1921 年 10 月间，俄国世界语盲诗人爱罗先珂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来到了上海，胡愈之以中国世界语者的身份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异国战友 并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文章介绍爱罗先珂，又通过鲁迅把爱罗先珂介绍到北京大学讲授世界语课程。

胡愈之对世界语运动的贡献赢得了国际世界语者的信赖和尊重。胡愈之初到法国结识的都是世界语运动的同志，他们给胡愈之提供了生活上的便利。同时通过参加法国工人世界语团体的活动，使胡愈之得以比较全面深刻地了解了法国社会，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增强了他研究马克思学说的愿望。另一方面 投身世界语运动 还使胡愈之得以周游、考察了欧洲诸国 如比利时、英国、德国、波兰以及苏联等 对整个欧洲获得了更多的感性认识，这于他的国际问题研究无疑大有裨益。

二、流亡与留学

来到法国，胡愈之接触到了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进入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更为他创造了机会。巴黎大学是法国的最高学府，教学设施先进，藏书丰富，学习风气浓厚，学术空气自由。胡愈之在此对国际问题的有关知识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学习。同时，他还到巴黎的新闻专科学校去听课，丰富了新闻学的知识，为日后主办《东方杂志》、《世界知识》、《救亡日报》、《南洋商报》、《风下》等报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胡愈之的少年时代最难忘的一件事，大概要算是在绍兴府中学堂时鲁迅先生在他的操行评语中写下了“不好学”三个字。巴黎大学时的胡愈之，显然与这三个字相去甚远了。据当时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心理学、哲学和美术史的朱光潜先生回忆，他与胡愈之早在上虞春晖中学时就熟识，胡愈之在巴黎留学期间，朱光潜也常利用英法之间便利的海上交通，来巴黎大学进修法语等课程，此时的胡愈之在朱光潜先生的印象中是一个大衣口袋里经常塞满报刊，大半是国际政治活动动态或是世界语方面的报刊，“他年纪比我还大一二岁，身体也比我差，可是工作头绪比我多几倍，他从容不迫地处理着多方面的繁重工作。我每逢想松劲偷懒时，一想到他的榜样，就提高自己的勇气。”

无论是为了维持生计，或是出于检验自己所学的知识，或是胡愈之所信奉的政治主张所驱使，总之，从1928年到1931年胡愈之在欧洲的三年当中，在《东方杂志》第25到第28卷上，以“本刊巴黎特约通讯员”的名义，用“愈之”、“化鲁”等署名发表了21篇文章，共达17万字，平均一年写了将近6万字，一个月

5000 字。涉及法、意、英、苏、德、印、芬兰、西班牙等许多国家时事,包括文艺、宗教、政党、和平与战争、选举等问题。如英、法、德、芬兰等国的选举,印度和西班牙的革命,第二国际与政权问题 国际劳工局与失业问题 罗马教皇 梵蒂冈与中国 以及凯洛公约,海牙会议,伦敦会议,裁军与备战等许多国家的诸多时事热点的综合述评,充分体现了他广博的见闻和深刻的政治分析能力,给国内关心国际形势的广大读者以深远的启迪。在旧中国报社派出的专职驻外记者极为有限,而能像胡愈之这样不断为国内寄国际新闻评论的更是十分罕见。胡愈之虽然被迫离开了中国,但他在国内的影响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一天天扩大了。

胡愈之在巴黎留学期间,每月曾花 600 法郎,在拉丁区(大学区)的一家旅馆里租了一间很宽大的房间,这在当时中国穷学生中还是不多见的。但他在吃的方面却极其节省,往往是到街头饭摊上站着吃一种“鱼餐”——几条炸小鱼和一些土豆。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便于上课学习和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接待巴黎文化界的人士。胡愈之在法国交往较多的是孙伏园和李石岑。孙伏园是胡愈之在绍兴府中学时的同学,“五四”时期在国内已颇有名气。李石岑则是商务印书馆的同事,“四·一二”抗议信的七位联名者之一。后来又在世界语活动中遇到了巴金,胡愈之曾帮他把小说介绍到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以便他靠稿费解决生活问题。

胡愈之在法国结识的最知心的好朋友就要算是孟雨了。孟雨是早年到法国勤工俭学的,后在法国一个细菌研究所工作,参加了当地的法国共产党。他介绍胡愈之认识了许多法国工人和共产党员,使胡愈之在思想上受到了较大的影响。

参加法国工人世界语团体的活动和与孟雨等共产党员的接触,使胡愈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五四”时期的胡

愈之倾向变革，但政治上还有无政府主义成份，1921年宣扬过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政见和道德观，1923年还赞扬过墨索里尼，视其为意大利民族复兴的英雄。出国之前，他对国际时事还有唯心主义的观点，对资本主义世界仍抱有幻想。然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状况是经济危机空前严重，各国一片萧条景象，生产不足，失业人数增加，生活费用逐年增多。冷酷的现状激发了他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强烈愿望。20年代初，胡愈之在上海曾看过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现在在学术研究比较自由的巴黎，他终于有机会阅读法文版和英文版马列原著了。特别是对《资本论》第一卷，认真地地下了一番苦功夫。开始，他感到《资本论》中的一些新概念、新思想、新逻辑难以准确地理解和掌握，就以坚韧的毅力、惊人的奋斗精神，一字一句一段地啃，一篇一章一节地钻，终于弄懂了商品二因素、劳动二重性、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和相互关系，弄清了资本积累的实质及其对工人阶级命运的影响，了解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这一番学习使他在思想上发生了一个飞跃，由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飞跃，深刻地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已经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树立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胡愈之自认为“这可算是我在法国留学的最大收获”。

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帮助胡愈之清除了对资本主义的最后梦幻，也激起了他对另一个新世界的强烈向往。1930年末，苏联建国已过12年，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究竟怎样，成了胡愈之当时最感兴趣的问题。在巴黎时对苏联的感受只能体现在他对苏联文艺作品的评价上，因受法国当局的取缔，他当时也只看了一些一般的作品和戏剧。即便如此，有限的讯息依然激起了他热情的赞美。他当时曾说过：“就我在巴黎所看到过的《一张沙发和一只床》、《亚细亚的风潮》、《土西铁路》在柏林所看到过的《大地》，

虽都是些不重要的作品，却都充分表现了真实的情绪和独创的风格，和充满着卑陋趣味的好莱坞作品相比，真要称是电影艺术中的一大革命了。至于苏联的演剧，我在巴黎见过的莫斯科艺术舞台演剧团所演伐丹戈甫的《都兰多公主》，梅友荷尔德剧团演的《巡查官》莫斯科犹太集团所演的《二十万》。这几次的观剧都使我感到十二分的兴奋和悦感。”

1930 年，法国经济的衰退加剧，法郎与白银的比值增加到了 1928 年初的 4 倍，靠自己菲薄的稿费收入，以及二弟胡仲持和其他亲友的资助，已无法维持他在巴黎大学的学习，只得中途辍学准备回国。

三、旅德访苏

严格地说，从离开巴黎大学的那天起，胡愈之的留学生活便结束了。我们无意否认学校系统的专业学习对胡愈之此后从事的新闻出版工作的重要意义，然而对一位热爱人类和平、关心国际时事和社会发展问题的社会活动家来说，真正有现实意义的事情，恰恰就是深入社会，运用所学知识研究社会，提出改造社会的主张并为之而奋斗。因而从 1931 年 1 月 12 日登上驶向苏联的国际特别快车到 2 月 3 日离开莫斯科胡愈之经德国到苏联的这不足一个月的经历、见闻和感想，对其一生的影响，显然是留学三年的其它任何时期都无法取代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巴黎大学时期对《资本论》的深入研究，没有此次的欧洲旅行，胡愈之恐怕还要在民主主义的圈子内绕很长的时间，甚至有可能毕生成为一个编辑行当的业务能手。这样看来，循着《我的旅行记》和《莫斯科印象记》所描述的旅途见闻去把握胡愈之的思想变化是极其必要的。

从巴黎回国，当时一般以走海路较为安全便利，胡愈之赴法时便是这样走的。但是，出于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浓厚兴趣和无比向往，他决定回国时走陆路，横穿整个欧亚大陆。于是，他首先与驻法苏联大使馆联系，得到了过境签证，但却没有获得在苏联逗留的许可。这时，他又想到了世界语组织，写信给苏联的世界语者，告诉他们自己到达莫斯科的日期，然后便不顾一切地踏上了长达 7000 公里的旅程。

关于从巴黎回国途经德国的经历，胡愈之曾撰写《我的旅行记》一文，发表在 1931 年 5 月号的《中学生》杂志上。胡愈之在欧洲的三年期间，足迹遍布法国、英国、比利时、瑞士、德国、波兰、苏联等七国，然而《我的旅行记》只写了从巴黎回国途经德国西部三个大城市的短短 10 余天的经历，可见这次旅行留给胡愈之的印象之深、影响之大。也正因为有了《我的旅行记》，胡愈之的这一段经历成了除莫斯科之行外，我们所了解的较为详细的一段。这篇游记虽然远没有胡愈之在莫斯科的见闻那样具有轰动效应，但它却形成了胡愈之走进社会主义新天地之前对资本主义世界最后也是最深的印象，这种印象便是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大量工人失业和现代工业对人类生存环境甚至人的心理的恶劣影响。

胡愈之在巴黎一上火车，就遇到了一位年轻的波兰乘友。这位就读于比利时一所大学的青年，已获得工程师资格证书，为维持学校生活开支，曾在巴黎做过汽车工、机械工，替阔人家看门，在墙头糊广告，而遇到胡愈之时已再次失业。虽然胡愈之在巴黎已经感受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恶果，仍忍不住发问：“既是工程师为什么不回波兰做事去？”波兰青年无可奈何地回答：“在波兰像我这样同样学历的人，有整千整万没有事做。所以只好再加深研究，方能得到一个位置。”胡愈之这才体会到知识者的恐

慌，原来到处是一样的。为了省出车费，这位青年连早点都舍不得用，胡愈之在与他分手之后还在替这位苦学生担心。这种担心像一团阴云自此开始弥漫了胡愈之的整个旅程。

胡愈之所到的德国第一站便是柯洛业，原本为访老友《世界语周报》的主笔而来，不料这位主笔卧病在家，因而使胡愈之得以结识了他的世界语导游，又一位失业者。这位世界语者本是一位银行雇员，失业已有两年，一见胡愈之便坦率地讲，因为没有钱，要叫胡愈之请他家人吃一顿午饭。饭菜的粗陋连胡愈之都不能下咽，但这家人却津津有味地饱吃了一顿，难免让人猜想他们一定是好多天没有饱餐了。失业的恐慌已无可避免地演化出生活的危机，这种令人悲忿的景象驱使胡愈之对所到德国第二站道特芒特意进行了考察。结果了解到道特芒全城失业工人多达6万人，为了每星期三次的失业登记，失业工人们每次要排两三个小时队，方能挨到登记柜前，虽然挤着满屋子的人，满屋子的愁苦与贫穷，但是大家都静悄悄的，非常守秩序。即便是示威游行的行列，也非常严肃。德国工人内部这些现象使胡愈之认识到了工人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出于对新闻事业的特殊兴趣，胡愈之还特地走访了工人的报纸。报纸脱离工人群众的现实反而使他意识到工人自己掌握宣传喉舌的重要性，激发了他将毕生为工人阶级、为劳苦大众呐喊的雄心。

从知识分子到普通职员，再到广大工人群众，胡愈之通过德国社会中下层生活、工作状况的考察，逐步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处境悲惨的工人阶级是完全能够团结起来，去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的。那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胡愈之急切地奔向苏联。

一到莫斯科，胡愈之便瞪大了好奇的眼睛，从车窗向外探望，只见路轨两旁有两列身披黄皮大氅，臂上和帽子缀着红星

章 雄赳赳、气昂昂的红军战士 格外的耀武扬威。他们给胡愈之的第一印象便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是不可轻视的。

1931 年 1 月 27 日 胡愈之在莫斯科一下车 就看到了站台上 有两位手持绿色星旗 世界语者的旗帜 的妇女。原来 莫斯科的世界语同志收到了胡愈之的来信，得知这位接待和帮助过苏联世界语盲诗人爱罗先珂的中国朋友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满怀兴趣，想在苏联参观但还没有得到签证的情况之后，立刻与有关部门进行交涉，取得了让他在莫斯科停留一周的许可，并派专人前来迎接。中午，苏联世界语同盟总书记与胡愈之在记者食堂共进午餐，然后派人联系让胡愈之住进了福金街二号无产者旅行社的招待所。

胡愈之到苏联的时候，正是苏联人民从事艰巨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时期，生活供应和住房各方面还存在着不少困难。但胡愈之记住了迎接他的妇女同志的话：“社会主义现在正在诞生中。一个小孩生产，都要经过分娩的痛苦，产生一个人类历史上所未曾有过的新社会、新秩序，怎么能不感到困难呢？但是我们苏联的人民都甘心忍受着这些困难。因为我们所得到的精神的快乐 足以抵偿物质的困难而有余。”三天后，一位苏联讽刺画家又对他讲：“现在我们是过着生平最美满的日子，而且是过得最合理的、公平的生活。”苏联人民对新生活的热爱更增加了胡愈之深入了解苏联社会的愿望。短短的七天当中，在苏联世界语同志们的帮助下，他先拜访了苏联世界语会总事务所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在他们的帮助和安排下，参观访问了许多地方。

胡愈之访问了苏联党和政府所在地克里姆林宫，亲眼目睹了长着满脸大胡子、穿着褴褛不堪的旧皮外套，腿上染满泥土的劳动群众在全苏维埃联邦的中央政府里自由出入，成了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人。

他参观了重工业的阿摩汽车工厂，轻工业的三山纺织工厂，农业的谷麦托拉斯，了解到了在苏联工人农民是为大众而生产，不是为少数人赢利而生产，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虽还未免过早，但却是向着这方向走去。与德国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相比，苏维埃的工人无疑是幸福的。关于谷麦托拉斯，胡愈之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他认为，1929年至1930年苏联的农业集团化运动，意义和十月革命一样重大，在世界各国农业衰落，农民经济困难的情景下，农村与都市失调，成为不可挽回的危局，唯有苏联的农业社会主义化，为全世界农民开辟了一条新路，为农民经济的唯一转机。

他访问了苏联最高学府共产主义大学，拜访了著名经济学家瓦尔加教授和中国问题专家沃伊金斯基教授，参观了中央图书馆，还访问了莫斯科一所模范小学，参加了少先队的大会，通过这一切，使他了解到苏联的教育完全是为了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劳动者出身的青少年同样可以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专门人才，比资本主义教育为特殊阶级培养特权人才和造就有效能的劳动者，无疑有天壤之别。

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多方面的接触，使胡愈之深深感受到了苏联人民的天真活泼、团结友爱和诚挚热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那些做了国家主人的工人、农民正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宏伟的事业中。胡愈之在《莫斯科印象记》中写道：“我亲眼看到了十月革命产生的奇迹，看到了年轻苏维埃不同凡响的精神面貌，我感到无比欢欣和振奋，未来的世界是属于社会主义的。”

《莫斯科印象记》在《社会与教育》杂志连载以后深受读者欢迎。1931年8月便以游记的形式出了单行本，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竟然连印5版。鲁迅先生称赞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记》是“不必用心戒备居然看完了的书”。邹韬奋特意在《生活周

刊》上写了《读莫斯科印象记》》称赞胡愈之叙述亲切有味 文笔通畅流利，令人非终卷不能自休。最重要的是本书的内容不仅遭到了国民党的查禁，而且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关注，党的领导人张闻天就曾通过沈雁冰约见了胡愈之，了解了他对党的看法和态度 胡从此开始向党组织靠拢。只是由于王明等人的“左”倾干扰，胡愈之没被发展入党，但他继续努力为党工作，在实践中接受党的考验和了解。胡愈之回国后协助邹韬奋编辑的《生活周刊》和后来主编的商务大型刊物《东方杂志》，都是坚持进步立场、适应抗日救国需要，倾向革命的进步刊物。1932年夏 胡愈之受鲁迅先生之邀，积极协助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工作，营救了陈赓、廖承志、许德珩等许多中共重要人物和著名进步人士。揭露了国民党政府迫害政治犯的罪行，争取了国际和平民主力量的声援。1933年9月 中共中央组织部终于通过决定吸收胡愈之入党，作为特别党员，由党中央特科直接领导，不参加基层组织生活。胡愈之终于实现了心中的愿望，从此开始在文化领域这条特殊的战线上为党更加努力地工作。

四、做人 and 做官

赵朴初在胡愈之 80 岁时曾写了一首贺诗《我爱愈之翁》对胡愈之一生的成就和为人做了很高的评价，诗云：“吾爱愈之翁，八十气犹旺。平易发谦光，温容蕴倔强。早岁露布书，敢与民贼抗。游记动一时，赤都播印象。救国出良筹，壮举多首创。功成而不居 江流自荡荡。与人照肝胆 见义轻风浪。白眼视奸邪 怒焰干云上。我诗非轻誉，艰难知所尚。老愿从公游，多闻而直谅。愿公慎起居 百岁长无恙。”胡愈之早岁的“露布书”如《五卅事

件纪实》、《四·一二‘抗议信’》前文已经提及，正是这种被周恩来同志誉为“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使得胡愈之在国民党独裁统治之下无处容身，不得不远渡重洋去留学了。胡愈之的这种政治上的正义感和勇敢精神，这种“见义轻风浪”的胆识是贯穿于他一生的个性特征。

留学回国后，胡愈之投身的第一件事便是呼吁抗日救亡。“九·一八”事变以后，面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和国际联盟装模做样的调查、调解，胡愈之撰写了《寇深矣》、《尚欲维持中日邦交乎》等文章，断言“非取断然措置，便是投降”，首先提出断交宣战的抗日主张。1936年6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成立，胡愈之等人利用聚餐会的形式，联络了大批知名爱国人士，积极展开抗日救国运动，被称为“救国会的灵魂”。1936年11月23日“七君子”事件发生后，胡愈之担负了声援营救的组织工作，通过报纸和其它舆论工具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写下了另一篇轰动一时的“露布书”《爱国无罪听审记》，真实地反映了爱国领袖反驳反动政府“控诉”的场面，充分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诬害“七君子”的真相，宣扬了“救国无罪”的观点。第二年6月，胡愈之又向新闻界发布了《救国入狱运动宣言》，与宋庆龄、何香凝等人一起发动并亲自实践的这次爱国运动，对于振奋人心、奠定民主权利的基础，意义重大，同时给南京政府当局及江苏高等法院以“极大的压力”，迫使当局于7月31日释放了“七君子”。

胡愈之这种刚正不阿的个性特征，这种“与人照肝胆”的品质，在“反右”和“文革”中同样表现得淋漓尽致。自50年代的“反右”斗争起，民盟由于其以知识分子为主的阶级性质，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政党”。胡愈之这位民盟中央副主席、秘书长本身的处境是可以想象的，同时由于胡愈之在文化界德高望重而又

平易近人、交际面广 因而成了“文革”期间“调查”的重点。胡愈之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革命负责，对同志负责，不畏强暴，在自身难保的逆境中保护了许多同志。茅盾是胡愈之 20 年代在商务印书馆时交往最多的好朋友，两人共同为新文化运动做出了很多贡献，胡愈之推崇茅盾是“鲁迅以外中国第一个革命现实主义作家”。“文革”中茅盾被诬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 胡愈之不顾当时的所谓“舆论”去看望他、安慰他、照顾他 仗义执言，终于使茅盾的问题得到正视。冯雪峰也是胡愈之在商务时便结识的老朋友，是文化界 30 年代抗日救亡运动的同志。由于坎坷的经历 冯雪峰在“文革”中备受摧残。1976 年冯雪峰去世后，治丧方案中 甚至不准称他为“同志”。胡愈之深感不平 经他多方奔走呼吁，总算争得了在当时举行的告别仪式上准用“同志”称呼的权力。同样 杨之华、萨空了、巴人、閔刚侯、孙源等许多遭受不公正待遇的老同志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在危难中都得到过胡愈之无畏的热情帮助。

“功成而不居”的无私奉献精神是胡愈之表现突出的优秀品质。胡愈之是 20 年代与“商务”、“中华”齐名的知识分子自己创办的“开明”书店的真正创始人 但他始终没有在“开明”书店挂名；30 年代被誉为“救国会的灵魂”，但他在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没有任何任职；他与邹韬奋合作经营的生活书店，在 1933 年到 1935 年之间，出版图书达 700 多种，使生活书店成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重要阵地 胡愈之被称为“生活书店的总设计师”，但他同样不图名利，是令人崇敬的纯真无私的无产阶级出版家。胡愈之对社会进步事业 诚诚恳恳、扎扎实实 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很多事业都是由他倡议、筹划和推动组织的，但他把荣誉让给别人，事业创办成功了，有了适当的负责人选 他就转而去思考、探索、创意另一种新的工作。他是一位能工

巧匠，一位超级设计师，通过他杰出的能力和雷厉风行的作风，任何新创的事业，往往都很快获得成功。但最后出面的往往又不是他。胡愈之就是这样为中国近代文化运动默默无闻地做了许多别人做不到的事，起了别人所代替不了的作用，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给后人留下了极宝贵的精神财富。

胡愈之一生耗费精力最多、贡献最大的事业，就是编辑、出版事业了。胡愈之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练习生做起，当过编辑、记者、翻译、编审、主编，留学法国之前创办过家乡报《上虞声》，“文学研究会”会刊《文学旬刊》，世界语刊物《绿光》。为推动“五卅”运动的发展，还创办过《公理日报》。留学期间他又系统地学习了新闻学知识。回国后协助邹韬奋编辑《生活周刊》，不久开始主编《东方杂志》，同时还创办了《新生周刊》、《文学》、《太白》、《译文》、《世界知识》等一系列刊物。他亲自主编的《世界知识》如今成为我国连续出版达 50 多年的仅有刊物之一。抗战期间又协助邹韬奋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后又主编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救亡日报》，同时陆续创办了文摘刊物《月报》、《团结》、《集纳》、《译报》等报刊，并主编过《国民公论》和新加坡的《南洋商报》等宣传抗日的报纸。日本投降后又创办了《民主时报》、《风下》、《南侨日报》等宣传和平、倡言民主的报刊。解放前后，胡愈之来到北京，任民盟中央机关报《光明日报》总编辑，并创办了大型文摘性刊物《新华月报》。胡愈之一生亲手创办、发起、主编或从事过的报刊不下二三十种，从业时间之长、编报种类之多、政治影响之大，在同行中堪称佼佼者。由于他在新闻出版界的杰出贡献和崇高地位，人民共和国创建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将新中国出版事业的重担交给了胡愈之。新中国成立后，胡愈之出任首届国家出版总署署长，先后解决了新华书店的统一领导，出版、印刷、发行分工合作及出版专业化等问题，为开创人民出版事业

新局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胡愈之不仅为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新型的出版机构，出版了大量的革命书刊和知识性读物，而且建立了新的体制，制订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奠定了初步和稳固的基础，是人民新闻出版事业的先驱者。

（樊宾）